

中国历代诗词曲论专著提要

中國歷代詩詞曲論專著提要

霍松林 主編

荀運昌題

張連第 林一

梅運生 漆緒邦

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208号

中国历代诗词曲论专著提要

霍松林 主编
张连第 林珂 编著
梅运生 漆绪邦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花园村)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科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75 字数: 504千

1991年10月北京第一版 1991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 001—4000册

ISBN 7-81014-542-8/I·16

定价: 10.70元

序

霍 松 林

在毁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空前浩劫终于过去之后，我们迈开大步，坚实而有力地跨入改革和开放的大发展时代，朝现代化的目标进军。在进军的行列中，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队伍同样英姿英发，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高质量的论文和专著层见迭出，相继问世，这是有目共睹的。

前几年有些论者偶言“反传统”，他们蔑视乃至否定传统文化（包括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理论）。这种割断历史的做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对发展民族新文化以至整个现代化事业都是十分有害的。这因为：第一，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积累起来的光辉灿烂的精神财富，在某些历史时期曾大放异彩，对全人类文化的繁荣昌盛起过积极作用。一旦彻底否定，无异于彻底否定中华民族自身，使我们的民族自信、自尊、自强之风扫地以尽，将何所恃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二，现代从过去发展而来，为了实现现代化，不能割断历史、抛弃文化传统，而应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在继承中求发展、求创新。

分明是古代文学理论，其研究又如何走向现代化？

鉴古知今，温故知新，这是一个方面；以近知远，以今知古，这是又一个方面。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现代化，并不是以现代为标准去改造古代文学理论的本来面目，而是指研究者具有现代意识，立足现代，面向世界，用全人类达到的最先进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从古今中外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联系中去研究古代文学理论，以满足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健康发展对古代文学理论营养的迫切需要。可以说，近十年来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在不同程

度上具有这一特色。正因为这样，才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中国向来被称为诗的国度。《诗经》《楚辞》而后，历代诗人辈出；名篇佳什，传诵不衰。唐诗、宋词、元曲，尤其享有世界声誉。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诗歌无疑占有显赫地位。与此相适应，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诗歌理论所占的地位同样很突出。而在当前，有志于振兴中华诗歌者日益众多，此唱彼和，掀起了遍及全国、超越国界的诗歌创作热，迫切需要历史的借鉴和理论的指导。我们有见于此，决定编著一部《中国诗歌理论史》。这一课题，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有着无比丰富的内容和极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是我们的一笔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这一笔宝贵的遗产，还没有得到过系统的总结。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就写出了《中国诗论史》。而在我国，时至今日，虽然对历代诗歌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却还没一部关于古代诗歌理论的系统之著作问世。《中国诗论史》的撰写，显然具有开创性的、填补空白的意义。我们自知从事这一课题，难度很大，责任不轻。只能兢兢业业地认真去做。

这一课题，由两部书组成。一部就是现在出版的《中国历代诗词曲论专著提要》，另一部是《中国诗论史》。我们觉得，对历代的诗词曲论专著（包括有理论价值的诗词曲选本）进行逐一的研究，明其作者、时代、版本情况，抽绎其主要的理论内容，确定其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的地位，编纂成书，也是中国诗歌理论史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其本身也有独立存在的学术价值。这对于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教学、科研的同行们，对于传统诗歌和诗歌理论的爱好者，对于志在振兴中华诗歌，企图从传统诗、词、曲论中吸取营养以提高创作水平的诗人们，乃至对于目录学、版本学的研究者，也许都会有些用处吧！当然，限于条件和修养，我们的“提要”难免有疏误，诚恳地期待着坦

率的批评和具体的意见，帮助我们在再版之前认真修订，臻于完善。

现在谈谈这部书的体例：

著录各书，重点在于撮述主要内容。内容提要的详略，取决于该书理论价值的高低，故有长达三、四千字者，亦有短至千余字、乃至数百字者。

著者生平及成书时间可考者，则简叙其生平，说明其成书时间。重要著作，兼述版本源流。

著录各书，按诗论、词论、曲论分类编排，各类均以作者生年先后为序，生年不明的，酌情处理。凡理论价值不高者，则列入“存目”，各作简介；亦分诗、词、曲论三类按年代先后排列。

本书共著录诗论专著214种，词论专著53种，曲论专著27种，共计294种。列入“存目”的，诗论专著88种；词论专著51种，曲论专著4种，共计143种。两项总计437种。这并非历代诗、词、曲论专著的全部，凡见于前人著录而其书不传者、或其书今存而我们尚未见得者，均未涉及。

参加本书撰稿的，六朝至金代为漆绪邦，元、明为林珂，清、近代为张连第，词论为梅运生。王南、胡山林、郭红跃、田南池、李逢春、张旭曙、潘繁生、陶礼天、彭玉平协助撰稿，做了不少工作。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热情支持本书出版，刘彦成、段启明同志在审稿中提出了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特致谢忱。

一九九一年元旦于唐音阁

前言

漆绪邦

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中，诗学作为专门之学，最为早出，最为发达；中国文论的主体，其实是诗歌理论（包括诗论、词论、曲论）。当然，我们这样说，只是就事实而言，绝无轻视散文、戏剧、小说理论之意。古代文献，经、史、子、集，浩如烟海，其间诗歌理论资料，取之不尽，用之难穷，就专著而论，即数以千计，实在是世界文论史上的奇观。对这一笔宝贵的理论遗产进行整理研究，前人和今人都已经做过许多工作，《中国历代诗词曲论专著提要》的编撰，是希望在这方面做一点进一步的努力。

古人论诗，其取径大体有三。其一是在政治、伦常、历史、哲学之著中谈到诗，往往也并不是把诗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来谈，谈诗，往往不过为了说明政治、伦常、历史、哲学诸问题。在诗学成为专门之学之前，这种情况最多。先秦经典、子书、史籍中谈诗，就属于这种情况，虽非专文、专著，但往往片言中的，从不同方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诗的认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这当然是诗歌理论思想的弥足珍贵的材料。魏晋以后，笔记杂著日兴，其中也往往有涉及到诗的，如刘义庆《世说新语》、范攄《云溪友议》、王定保《唐摭言》、罗大经《鹤林玉露》等等。虽著作性质不同，也可以归入上述情况。其二是专文论诗。此中实际又有两种情形。一是笼统论文，而实含诗，以唐代及唐以前为多，唐以后亦间有之，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萧统《文选序》、李德裕《文章论》等。二是专以论诗，唐代及唐以前有之，如《毛诗序》、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陈子昂《修竹篇序》、白居易《与元九书》等；唐以后就多起来了，文人别集中的诗集序跋、关于诗的书信往还等等，即属此类，可谓比比皆是，举不胜举。论诗诗创自盛唐李、杜，以后屡见，虽出之以诗的形式，但仍可认为是专以论诗之篇。其三就是专著了。论诗专著，当以梁钟嵘《诗品》为

第一部，隋唐以前，今所存者，也仅此一部。唐以后始多，如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孟棻《本事诗》、司空图《诗品》等；自北宋“诗话”之体兴，历金、元、明以至于清，诗论专著蔚为大观，达于繁荣的极点。

诗歌理论专著的兴起和发展，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其契机则有三：一是诗歌创作经验的积累，二是诗歌在社会文明中的地位的确立和提高，三是诗歌审美意识的自觉和深化。大体而言，诗歌理论专著的兴起和发展，经历了滥觞、兴起和繁荣三个时期。

自六朝至唐五代是诗论专著的滥觞期。

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论专著，是梁钟嵘的《诗品》。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诗话》称钟嵘《诗品》是“诗话之源”，并且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所说自有其理。应该说明的是，钟氏《诗品》之前，研究《诗经》的专著已经大量出现。汉儒治经，《诗》为大宗，仅《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之著，即有六家四百一十六卷，东汉之世，还有大名鼎鼎的《毛诗》郑笺等等，魏晋时期，治《诗》之著尚有多种。这些著作，俱“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为什么不能称之为诗论专著而反以后出的钟氏《诗品》为第一部呢？这是因为，这些著作是经学，而不是文艺学。儒生治《诗》，并没有把诗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他们也不具有诗歌艺术审美的自觉意识；经学作为封建政治的附庸，儒生治《诗》，也只是为了阐明王道、教化之类的教义。因此，他们不可能看到《诗》作为诗歌的本来意义上的艺术审美价值，也不可能通过治《诗》真正揭示诗歌创作、欣赏的客观艺术规律。当然，《诗》自身究竟是艺术产品，儒生治《诗》，不可能丝毫不接触诗歌艺术方面的问题，如果能剔除种种政治说教的蒙蔽、歪曲，我们从中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有关诗歌艺术的有价值的见解，获得一些有关我国诗歌理论思想发展在一个阶段上的有价值的资料，如在我国诗论史上有重要意义、巨大影响的“言志”说、“六义”说，在汉儒治《诗》之著中都有阐发。但儒生治《诗》之著，终究

不能称之为诗论专著。真正意义上的诗论专著的产生，只是在文学进入自觉时期之后才可能有的事情。

文人抒情诗始行于东汉末季，与之并行的，则是社会思潮的深刻转变。随着东汉王朝的没落，经学衰微，清议流行，有史以来自觉不自觉地附着于贵族政治的士阶层，开始看到了自己的独立价值的一面，士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汉末仲长统论曰：“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羲夫人帝王之门哉！”（《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这可以看作是士人早期的个性宣言。文学，特别是诗的发展，最需要主体意识的觉醒，个性的发扬。随着个性宣言的发表，必然有文学——诗的解放的呼声，“叛散《五经》，灭弃《风》、《雅》！”（同上）此虽发自仲长统个人，却实在是时代的呼声。由于新的时代思潮的有力推动，刚刚兴起的文人抒情诗的创作，在建安时期迅即形成繁荣的局面。“暨建安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这是刘勰在近三百年以后的描述，已足见建安诗坛的昂扬和兴盛，却不如曹丕在当时的总结来得深刻：“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论文》）个性是文学的生命，文学又是个人生命的无限延续。这是全新的文学价值观。于是，文人乃有意为文学，为个性的实现和自足而为文学，文学终于摆脱了经学的羁绊而走上了自觉发展的新路。建安之后，诗歌创作又经过三百年的发展，文人抒情诗得到社会的普遍的承认，齐梁之间，诗简直成了士人身份价值的标志。其间出现过太康、元嘉两次繁荣的高潮，也产生了“江左篇制，溺乎玄风”（《文心雕龙·明诗》）那样的曲折，诗歌创作的实践，已经有了足够的积累，正面的经验，反面的教训，都已充分展现。在认识方面，继曹丕“文以气为

主”之说之后，陆机又铸成“诗缘情而绮靡”的新说，加之南朝诗坛上词采、用典和声律问题的论争，诗歌的艺术审美特性在主体、客体、内容、形式诸方面都已得到了明确而日渐深入的认识。系统的论诗专著产生的条件已经成熟，加上品评人物，品藻艺文风气的推动，于是有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的出现。综上所述，从先秦诸子片言说诗到梁钟嵘系统论诗，其间长达千有余年，经始之难，于此可见。唯其如此，《诗品》才没有一般的开创之作的粗糙和简陋，而具有其成熟的特征。从诗和自然、社会，诗和诗人，诗的审美特征，诗的艺术构成，到诗的历史、诗的流别，作诗的避忌，凡是诗的实际中当时所可能提出的问题，《诗品》不但都作了回答，而且不乏精辟之见。其品第高低，追溯渊源，在后人看来，不无失当之处，但瑕不掩瑜，不必苛求。

唐代承六朝已成之势，诗歌创作向更大的广度和深度发展，成为世界文艺史上罕有其匹的诗的王国。就古典诗歌的创作来说，唐诗已经达到了完完全全的成熟；可以说，诗歌艺术创作中的一切问题，唐人在实践中都很好地解决了。无论情感的抒写，物象的描绘，意象的构成、境界的创造，唐人都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经验；一切的体制，种种的格法，在唐人那里也是应有尽有。但是，唐代是一个艺术的时代，审美的时代，却不是一个理性思辨的时代。唐代处在玄学和理学两个理性思辨的高潮中间，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相对沉寂、相对贫乏的时期。因此，唐代在诗论方面，却没有与诗歌创作相应的辉煌；唐人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无比丰富的艺术经验，当时不能说完全没有理论的表述，但大多是留给后人开掘、总结去了。当然，绝不能因此就说唐人有诗而无论。就诗论专著来说，唐代远远说不上兴旺发达，但特别富于创造性的唐代文人，在这方面还确有不少的创造；如果要探究后来诗论专著的体式，往往是要追溯到唐代的。

唐人在论诗之著方面的创造，举其要者有：一、以选论诗。选文成集，并非创于唐人，远在西晋，就有挚虞的《文章流别集》，

梁代又有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后者还特别受到唐人的重视，以致大诗人杜甫教子作诗，都说要“熟精文选理”。选文总要有一定的标准，总要表明或透露一定的宗旨，因此都或多或少有一定的理论的价值。但以上两书都不是专门选诗，前者已佚，面貌不清，后者有序，宗旨甚明，而于作品，只是分类罗列，缺乏评论。专选一个时期的诗（特别是当代的诗），有序以明宗旨，有评以论诗人，则创自唐人。其最著者，为盛唐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是书不但有序有评，且有《集论》一篇表明对声律问题的态度。其后则有中唐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等。唐人以选论诗，对后代大量的以选论诗论词之作如方回《瀛奎律髓》，钟惺、谭元春《诗归》、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朱彝尊、汪森《词综》等等都有影响。

二、以格法论诗。诗格之著，创自唐人。一方面，格律诗在初唐成型，此后成为唐人擅长之体。诗格之著偏于讨论声病对偶问题，是唐人格律诗创作在形式技巧方面的丰富经验的总结，同时也适应了格律诗学习和普及的需要；另一方面，唐代以诗取士，应试之作，又一定是律诗，诗格的研究还出于士子这方面的功利的需要。因此，唐代（以及五代）诗格之著颇多，其著者，有王昌龄的《诗格》、齐己的《风骚旨格》等。皎然的《诗式》也带有诗格的性质，但似无功利方面的因素，所论也不限于格法，而是从“诗教”大处着眼，讨论了诗艺的缘情、通变、境界等重要问题，同时已透出了以禅论诗的端倪。唐以后，诗格之著除元代外罕有产生，但从大量诗话讨论格法的内容，还多少可见唐人的影响。

三、以事系诗。以事系诗的记载，始见于《左传》，如郑庄母子之歌《大隧》（隐公元年），许穆夫人之赋《载驰》（闵公三年），孟子还有过“知人论世”的带有理论性的阐述（《孟子·万章下》），汉儒传诗，多言本事，尤以毛公为著，但大多出于附会，六朝、唐人笔记涉及诗者，亦间记本事。而专载本事以成书，则创于晚唐孟棻的《本事诗》，继作者，还有处常子《续本事诗》、罗隐《续本事诗》。北宋诗话初兴，往往以记事为主，显然是受了孟棻的影响，以致

罗根泽先生说“诗话出于《本事诗》”(《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五篇第五章)。四、以句图论诗。初唐人好选辑前人诗中工丽之句,以供玩味欣赏,亦有利于揣摩学习,如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吴兢、元鉴《续古今诗人秀句》。受此影响,晚唐、五代出现了许多诗句图之著,大体上也是出于诗歌创作艺术方法的示范的动机,与秀句之辑,性质相近,但往往宗旨更为明确,其著者,有张为的《诗人主客图》。此书在各诗人名下引诗摘句,确有示范警策之意,但更重要的是此书将中唐以后诗人分为六派,每派又按主客序列。其主客派别的安排,在今人看来确有不当之处,但诗派的观念已十分明确,后代诗派之说,应该就是由此发源的。唐五代以后,句图很罕见了,但人们在诗话之著中往往摘句以明意,或多或少地是受了句图的影响。五、以诗论诗。在一首诗的个别地方表现出关于诗的理论观念,《诗经》里面就有了,而以整首或整组诗表明对诗的见解,有意的以诗论诗,则创自唐人,其首创者,当是盛唐李、杜。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之第一首,就是一篇完整的论诗诗,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则以组诗论诗,比较系统地表明了他关于诗的创作、学习、承传、新变的观念,兼有史、论、评的内涵,对后世论诗,影响很大。应该指出,晚唐司空图的《诗品》二十四则,也是以诗论诗,不过所采用是当时诗人已罕作的四言的形式。《戏为六绝句》是以诗的形式发议论,《诗品》则不是以议论为主,而主要是将诗之各境化为意象,以透出各境的特征,将丰富而精辟的理论见解寓于意象之中,似乎可以说是更为典型的以诗论诗。总起来说,唐代诗论专著不多,但创造性的工作做得相当不少,后人形形色色的诗论专著,常常是可以在这里找到端倪的。

宋及金、元,是诗论专著的兴起期。

宋初半个多世纪中,诗歌创作大体是沿着唐人的路子,新变只是在酝酿之中。诗论也大体沿着唐人的路子,诗格、句图之类的东西还在偶尔出现,论诗之著,总的说比较沉寂。仁宗天圣(1023—1032)中期以后,情况有了变化。经过梅尧臣、欧阳修等

人的切磋、经营、倡导以及创作实践上的示范，对后进的奖掖提携，诗坛活泼起来，新的诗风也形成了。可以说，从这时起，才有了真正的宋诗。宋诗是在新变中求存在、求发展的。既然唐人已把好诗做尽，沿着唐人的路子走，当然不可能有出息，更谈不上超越。西昆的不成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梅、欧等人手中形成的真正的宋诗，较少在唐诗特别是盛唐诗里所常有的浩歌激烈、自然明快的调子，较少中唐诗人的平易直率和奇险怪诞这两个极端，也不同于晚唐诗常有的新巧苦涩，而是表现出一种优游坦夷，深沉冷峻的风调。一般地说，宋诗依然是缘情的，但缘情而不纵情，在情感的抒写中让人感到理性的制约和收束；比起唐诗来，宋诗是平淡的，但又不是中边皆淡，而是在平淡之中有一种愈久愈浓的真味。苏轼赞赏陶渊明、柳宗元诗所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韩柳诗》），正体现了宋人对诗的审美好尚。宋人追求“语新意工”（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不同于盛唐人的自然天放，但也不同于中晚唐人的戛戛苦吟，造语创意虽出之以难，但锻炼得从容，其结果是没有多少斧凿的痕迹，似不出奇，倒更容易制胜。在新的诗风的酿成中，新的论诗的风气也酿成了。由于社会的承平，仕进的容易，也由于理性思考之风的重新抬头，士人对文化艺术问题的思辨的兴趣浓起来了。这个时期，文人书信往还，诗篇赠答，以及写序作跋，颇好谈文论诗。在这样的空气中，产生了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话——欧阳修的《诗话》，即后人所称的《六一诗话》。

《六一诗话》并不是我国古代诗论专著的第一部，却是诗论专著的影响最大的全新体制诗话的第一部。从诗论专著的历史发展看，《六一诗话》的产生是渊源有自的。诗话之源，或认为出自钟嵘《诗品》，或认为出自孟棻《本事诗》，已如前述，也有认为是出自先秦文献关于诗的片断记载和议论的，如清何文焕《历代诗话》卷首的题语。各说都有各自的道理。但诗话是诗歌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古人种种论诗的手段对诗话的产生都有不同程

度的影响,是很难定其源于某书某说的。就《六一诗话》说,其内容,不外论诗与记事两端。论诗,或涉及诗艺大旨,或涉及诗人、诗作的评论,也有佳句妙语的玩味;记事,或记诗作本事,或记诗在流传、鉴赏中的佚事。《六一诗话》中也偶有事典辞语的考证,但远不如后出的一些诗话为多。其形式,则是随笔式的,并无严格的统绪,忽谈诗,忽记事,忽录别人之语,或载一己之见,偶尔还杂以无关宏旨的谐谑。可见,《六一诗话》在内容方面吸取了宋以前人谈诗的种种手段,在形式方面则是采用了唐时已盛而宋时最为流行的笔记杂录的形式。总起来说,诗话的产生,是宋以前诗论的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体式,则直接来自笔记之著。

自欧氏《诗话》出,继起者接踵连肩,自北宋以至晚清,形形色色的诗话大量涌现。可以说,欧氏《诗话》以后的诗论专著,主要就是诗话。

宋代诗话之著以百数。(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考》著录共一百三十九种,其中一小部分乃后人自别集、笔记辑录成书,而作者则本无是著,如《东坡诗话》、《容斋诗话》、《老学庵诗话》之类。)这些著作,大多标以“诗话”之名,也有称作“诗评”、“诗说”的,也有称“谈”,称“录”的,个别的则用其他名目,都可以统称之为诗话。

终两宋之世三百余年,诗话之著纷出。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是凝定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尤以内容方面的变化值得注意。宋诗话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北宋诗话,大多以记事为主,兼以论诗,欧氏《诗话》即是这样,继出的司马光《续诗话》、刘攽《中山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唐庚《唐子西文录》、许颢《彦周诗话》等,也莫不如此。对诗话的看法,大体不出于欧阳修所谓“以资闲谈”,后来许颢《彦周诗话》开宗明义为“诗话”正名,谓“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若含讥讽,着过恶,诮纰缪,皆所不取”,对诗话的撰述看来自觉、严正了一些,但即就

《彦周诗话》的内容看，仍大体不出欧氏《诗话》的路数。到了北宋之末，情况开始有了变化，如叶梦得的《石林诗话》，记事之处仍然不少，而论诗之处则明显地增多了，较之前此之著，有更鲜明的主旨，更强的理论色彩。南宋诗话，不少仍循记事为主的路子，但风气有进一步的转变，出现了论诗为主兼以记事，或只论诗不记事的诗话。其首出者，为张戒的约成书于高宗、孝宗之际的《岁寒堂诗话》。此书主要特点有二：其一，以论为主，几不载事。其二，主旨突出，论题集中，以“言志”为宗旨，强调诗情“从胸臆中出”，并主要评论六朝至唐宋大家之诗，更专以下卷评论杜诗，以明此旨，虽仍不很系统，但也实非随手拈来，散漫罗列。同一时期之著，还有黄彻的《碧溪诗话》、吴可的《藏海诗话》，也是主于论的。此后，主于论或专于论的诗话著作，还有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严羽的《沧浪诗话》、范晞文的《对床夜语》等。其中姜、严之著，专于诗论，主旨更为集中，理论价值最高。

在形式上，宋代诗话虽始终采用随笔的体式，但前后也有变化。初期的诗话，随手罗列，漫无统绪，南宋人作诗话，往往是有意识地著书立说，在体例编排上不同程度地有了讲求，内容的取舍也多少有了标准。特别是《沧浪诗话》，不但有明确的宗旨，而且有明确的体例：最先《诗辨》，阐明其论诗的纲领性主张，近于钟嵘《诗品》之序；其次《诗体》，辨明体制；其次《诗法》，实际是从“法”的角度充实其论诗基本主张；其次《诗评》，通过对《楚辞》、汉、魏、晋、六朝、唐人诗的评论印证其论诗基本主张；最后《诗证》，考证诗作、诗句，以正讹误。《诗评》、《诗证》，近于随笔写法，而从总体看，有主旨，有系统，在相当程度上脱出了随笔的窠臼。

总之，宋代诗话在北宋中期始出，作者众多，堪称兴盛。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在内容形式上都日趋成熟。除了单行诗话的兴盛，更有诗论类辑式的大型著作如《诗总》、《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的出现。这些都为后代论诗之著的繁荣，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金代立国，几与南宋相始终，垂百余年，为时并不算短，但社会比较动荡，仅世宗、章宗之世，有一个相对安全时期，诗坛不盛，诗论专著也罕出，可举者，仅王若虚《滹南诗话》与元好问《论诗三十首》。

元代是我国古代诗史的转变时期。其转变的轨迹，就是上承南宋后期抑宋而尊唐音，下开有明一代的拟古诗风。先是永嘉“四灵”和江湖诗人特尊贾岛、姚合以为“唐音”，继起的严羽更提出以“盛唐为法”。元人承南宋后期已成之势，一开始，就明确地“一以唐为宗”（顾嗣立《寒厅诗话》）。元初诗人戴表元曾痛切指出宋诗至末叶之弊，强调地主张“升级而趋唐，入室而语左”（《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九《洪潜甫诗序》）。按此序写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正可代表元初诗坛的一般趋向。元代诗论，大体而言，就是在宗唐的趋势下发展的。

元初诗论著作，有些是出自南宋遗民之手，如韦居安《梅磭诗话》、蒋正子《山房随笔》、方回《瀛奎律髓》。后者以选论诗，理论上坚持的是江西诗派法门，似不合时流，但在理论上自有其价值。真正作为宗唐的鼓吹的，是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在诗歌艺术方面。文房对唐诗极为倾服，他“游目篇简，宅心史集”，为有唐诸诗人作传，正是为了弘扬唐风，为一世立则。《唐才子传》上承严羽之绪，下启一代新风，在严羽到明高棅、士子之间起着桥梁作用。《唐才子传》以评传的方式论诗，在体制上也是一个创造。元代诗话之著，还有吴师道《吴礼部诗话》、陈绎曾《诗谱》、祝诚《莲堂诗话》、佚名《南溪诗话》等。元代诗论著作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讲格法的著作又颇盛行。诗格创自唐人，晚唐五代为多，至宋已罕见。大约是元人作诗越宋宗唐的关系，作诗格的又多起来了，而且往往托名大家，和晚唐五代诗格托名白居易、贾岛，甚至魏文帝相似。元代诗格，今可见者，有十余种，如杨载《诗法家数》、范梈《木天禁语》、《诗学禁脔》、揭傒斯

《诗法正宗》等。体式大多近于晚唐五代之著，但由于诗论究竟已经过宋代三百多年的发展，元人诗格，往往吸收宋人的理论成果，在理论水平上较晚唐五代人有所提高，除了讲格法，还涉及到一些诗歌艺术的重要问题。

两宋金元时期，由于新的诗歌体裁词、曲的兴起和繁荣，诗歌理论的新的方面——词论、曲论也兴起了。由于词、曲在艺术性质的一些重要方面与诗相通，而诗论已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有了诗论这个现成的重要的参照，故词论、曲论专著的兴起距词、曲成熟的时间并不那样长。最早出现的论词专著，是北宋中期杨绘的《名贤本事曲子集》，全书已佚，今仅存梁启超、赵万里所辑数条。从所存看，是因事系词，词事兼备，体例上兼有调选和词话两种职能。就记事言，是受《本事诗》的影响而作。其后有南宋初年王灼的《碧鸡漫志》，是现存最早的体例完备的重要论词专著。此书论歌曲之源、词的形成，品评北宋欧阳修、苏轼、贺铸、周邦彦、李清照等重要词人之作，间亦记其本事。其中对苏轼词的评价，尤为后人瞩目。词号称“诗余”，但有异于诗。《碧鸡漫志》考较音律，论述音律和词章的关系，考证词牌的沿革，后出的词话，大多不外此例。张炎的《词源》，是宋代最著名的词论专著。张氏精通音律，是南宋继姜夔之后又一著名词人。其论词是音律、词章兼重，在词章上提出雅正、清空、意趣等一系列审美规范，并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又对南宋咏物词作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总结。张氏的词学，对有清一代特别是浙西词派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后，沈义父的《乐府指迷》论词虽大体不出《词源》的范围，但亦差可接武。至于元初陆辅之的《词旨》，只不过是补充例证，阐述其师张炎论词的要旨而已。宋人好论诗，兼好论词，许多笔记、诗话都有论及词的，有的还厘为专卷，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十七之论乐府，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后集卷三十九之论诗余，辑出单行，即为论词专著。“词话”之名，宋代即在诗话影响下产生，如杨湜的《古今词话》、